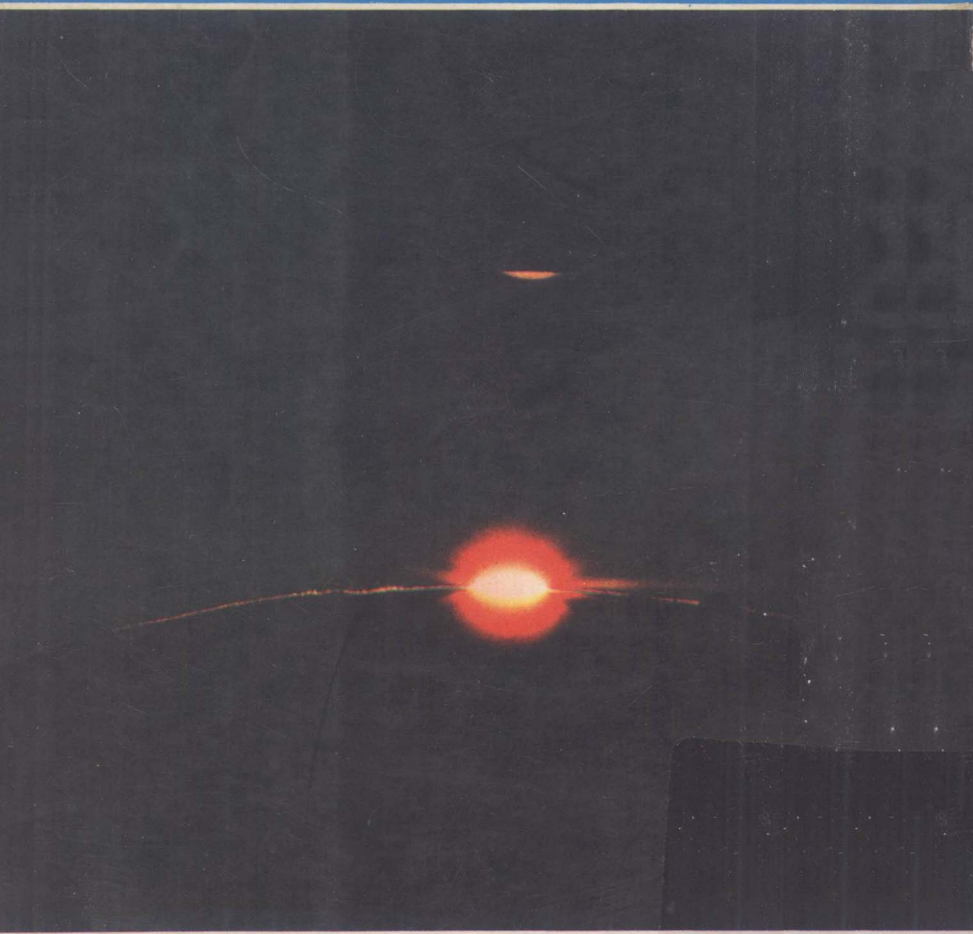


鳴 鷄 雨 風

著 林雪蘇



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印行

鳴 鷄 雨 風

著 林 雪 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行 印 社 應 供 書 圖 化 文 成 源

風雨鷄鳴

著 林 雪 蘇

新臺幣 四元五角
新加坡幣 四元二角

定價

已登記版權 · 翻印必然追究

版權

發行所 李源成文化書局
地址 臺北市北門外順泰街四一巷七十一號(辦事處)
電話 北臺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 警字第一九三號
印刷所 裕西市北永豐廠
地址 北臺三
電話 永豐廠
印刷所 裕西市北永豐廠
地址 北臺三
電話 永豐廠

出版者

承印者 永豐廠
地址 北臺三
電話 永豐廠

承印者

香港總經理 馬星負
地址 香港軒尼詩道四七號
電話 五五五

海外經銷者

新加坡總經理 李源成
地址 新加坡美芝路黃金大廈一八〇號
電話 二九二

出版日期

第一版 /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五日

封面設計 / 穆無天

本書及本社之一切法益，由大律師 羅行保障之

大律師 羅行

臺北市武昌街二段三十七號六樓B室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九·三七一—八一四九

自序

民國四十一年我自海外來臺以後，出版了若干集子，以散文居多數，散文又以文藝性者居多數。這個集子也是散文，性質則比較嚴肅，所收大都是逢年過節應各報刊編輯索寫的應景文章。論其性質則是一些政治上的感想，社會現象的評論，學術思想與歷史文化的研討。寫作時期有在四十餘年前者，有在數年前者，寫作地點則自武漢至四川及臺灣。真像個破舊攤子，所陳列出來的貨色，盡是些陳芝麻，爛綠豆，沒幾文錢可值。

或者要說這些文章既無價值可言，擲之廢紙簍算了，還來災梨禍棗做什麼？不過文章雖無價值，半世紀多災多難國家的形貌，半世紀中國思想界變化遷移的趨勢，皆可於我這個集子約略看出。我個人為當時世局所激發出來的思維和選擇自己應走的道路，也可於這個集子窺其大概。將來若有人想研究蘇××的思想，這本集子倒不失為一種重要參考資料，是以不忍拋棄，結集公之世間。

• 序

我的思想是什麼呢？說來也很簡單：第一是反共信念的早定，第二是民族文化的愛護，第三是尚武精神的發揚，第四是倫理道德擁護的頑固。

談到反共的信念，今日臺灣作家誰又沒有？自大陸來臺的忠貞人士不必說，即土生土長的本省同胞雖未親遭共禍，耳濡目染，這種信念也自然在腦子裏生根。但半世紀以前大陸知識份子能有明晰而堅定的反共思想，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那個時代，整個世界還都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霸佔控制之下，這兩者所釀的罪惡也真是罄南山之竹不能書，揚東海之波不能滌，凡有公理愛與正義感的人對於這個現象，莫不痛心疾首，希望有種變動，一種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將舊秩序完全摔碎、消滅，另外出現一個公平合理的局面來。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學說，宣傳已及百年，第一次大戰後，俄國革命成功，以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自命，世界億兆受剝削的貧農勞工，固無不翹首東望，視蘇俄爲解放的堡壘，人類的救星，即著名學者文人也沒有不醉心於共產主義的。第一流學者文人如俄之高爾基；英之蕭伯納、羅素；法之羅曼羅蘭、紀德之外，無數大學教授，青年學生以及一般文化界，或多或少，思想總帶左傾色彩，否則便覺得對不住自己的良心，怕人譏爲沒有血性的人物。至於我們中國，百年積弱之勢，並未因辛亥革命成功而獲改善。軍閥割據，內戰年年，盜賊如毛，民窮財盡，而國際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各方面所加於我們的壓力，更教我們氣都透不過來。我們盼望大變動之發生，比之普世知識份子更殷切百倍。再者，人們心理對於某種問題的解決，總不願枝枝節節地做，總愛一勞永逸，來一個徹底。那個時代誰不把共產主義當做徹底解決的救世良方，當做一顆仙丹，以爲一吞下，便可脫胎換骨，超昇上界呢？

我那時也是個頗有良心和血性的青年，也曾誤認共產主義是一種比較進步的主義。但民國十

年間，第一次赴法留學，與幾於全部赤化的中國勤儉同學相接觸，見他們那種迫脅他人曲從已見的橫暴作風，和否認祖國倒向蘇俄的理論，便感不滿；又在里昂某個展覽會場，看見被史大林餓死數百萬農民之一的蠟像，淒慘之狀，觸目驚心，我對蘇俄的共產主義更起了莫大的懷疑。

但真正逼我走上反共道路者卻是魯迅和他那一羣嘍囉的作爲。左翼活動最爲激烈的時代是民國十九年魯迅加盟左翼聯盟起到廿五年魯迅病逝上海那幾年之間。這個土匪大師，青皮學者，施出他層出不窮的，惡毒無比的一些絕招；什麼「扼殺」「窒死」「打落水狗的精神」「獵狐式的包圍」，鐮刀列左，斧頭列右，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那時候全國比較重要的作家，都已左傾，青年們爲了要追逐這個時代潮流，兼爲自己將來出路，當然爭先恐後地投入共黨的陣營。大概在魯迅未死前，文壇已整個被共產篡奪，不久整個文化界也被他們魔掌控制住了。西安事變後，赤色氣燄一度稍抑，對日抗戰爆發，共黨虛言與國民政府合作，僅是表面文章，骨子裏仍我行我素，四面八方，埋伏火種，預備造成燎原之勢。這些話我在「我論魯迅」及其他集子裏，提到不止百十次，讀者可以覆按，恕不複述。

左派之橫行霸道，蠻不講理，叫我這個深受五四時代唯理主義薰陶的人，實在瞧不過眼，並且深懷不平。而且我那時已隱隱感覺到政權若落到這派人手裏，不能爲中國國家民族福，反足爲禍。民國廿一、二年間我在國立武漢大學講授新文學，在所編纂的講義裏，固痛斥魯迅這一幫人，對學生講話也抨擊左派，不遺餘力。本集「文學有否階級性的討論」寫於民國廿一年間，後

來中文系學生請我演講，即以此文宣讀，收入他們辦的一個刊物。那時梁實秋先生正和左派開筆戰，左派主張文學有階級性，梁先生則說沒有。我這篇文章是響應梁先生的。雖卑無高論，也可代表我對當時流行文藝理論的意見。「不信任自己」寫於廿四年，我在武大講授新文學反對左翼的事，左派亦有所聞，（他們偵騎密佈。無孔不入，可見一斑）左派早已認定我決不能成為他們的同路人，從此對我開始祭起「扼殺」「窒死」的法寶。我的文章再也打不進當時著名的文藝刊物，只好在國民黨辦的「文藝月刊」和「文藝先鋒」等雜誌裏混。那種雜誌，錯字多，印刷欠佳，銷路非常仄狹，我的寫作生命果然被扼窒得只剩一絲游氣了。我正式揚起反共大纛，是廿五年冬間所寫的一些反魯文字，現皆收「我論魯迅」中。魯迅與中國共產黨本是二位一體，反魯即所以反共。有人笑我魯迅在世時不敢反他，死後始反，是為「打死老虎」。我說這隻死虎比活虎還難打，因為它身傍小老虎不計其數，張牙舞爪，欲得你而甘心；你就逃到天邊，角落裏也會猛然躡出隻不知什麼名色的野獸，惡狠狠地咬你一口。我自反共反魯後，被新文壇摒為化外之民，那還是小事；所蒙受的攻訐、誣譏、毒罵、污辱，擢髮難數，迄無寧日，雖比不上共匪所加於胡適先生數百萬言的「謗書」，在新文壇也是個少見的例子。幸而我自幼生成一種麻木天性，又以受辱太多，體內沈澱着的「抗毒素」相當厚，否則氣也給早氣死了。這纔知道蘇俄共產政權壓伏異已有「臭罵」之一法，我國共匪效顰而有「把人搞臭」之一作為，果然厲害。而共匪又從魯大師學來前述那些扼殺窒死……幾種花招，更加之以「韌的戰術」，就是罵人罵開了端，便永無休止

地罵下去；獨自一人罵不算，還要呼朋引類地罵；明罵不算，還要運用魯大師傳下的法寶——「四知文學」，時時寫些只有你看懂的文章，暗中刺你一刀，踢你一脚。一個人忍耐總有限量，這樣糾纏下去，總有使你神經總崩潰的一天。左派篡奪文壇和霸佔思想界時，所有知識份子明知他們說的話沒有道理，也只有仗馬寒蟬，箝口自保，竟無一人，敢攔其鋒，也是難怪的。國無正論，一般老百姓無所適從，青年更一面倒入共產主義的懷抱，終釀神州陸沉之禍，這也是勢有所必至，理有所固然的。再者羅素、紀德早年雖傾向共產主義，覺悟之後，使寫作篇章，極力反共。我們中國卻沒有這種自由，整個文壇和思想界既落入左翼的掌握，封鎖得密不通風，你即有文字也無發表之地，即在無黨派的刊物上發表，他們即用這種卑劣下流的手段，來打消你寫作的興趣。在那赤燄彌天之際，有個人匹馬單槍向龐大的風車挑戰，雖被風車巨翼摔得個半死，並被人笑爲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勇氣究竟是可嘉的吧！

在第三輯歷史的教訓裏，有一篇論文主張從速編寫抗戰史。這篇論文曾發表於重慶益世報的星期評論，寫作時期大概是勝利前一年。因爲我在武大同人中竟聽見一種傳說：對日抗戰許多硬仗、大仗，都是八路軍打的，國民政府的軍隊不過坐享其成而已。我深感詫異，知道共匪厚顏無耻，任何謊言都可說得出口，怕勝利後，他們要將八年苦戰，抵抗暴日的功勞，攘歸己有，是以有編寫抗戰史的提議。於今共匪對外宣傳，果不出我之所料，假如抗戰史早日編成，情況也許會好一點吧！

「明末唐魯桂諸王覆滅的主因」，也是同時所撰。民國廿九至卅年間，我替中央宣傳部寫了一本「南明忠烈傳」，利用該書若干資料，寫了七八篇短篇歷史小說，初版書名「蟬蛻集」，再版改名「秀峰夜話」。抗戰末期，共匪撕下了與國民政府合作抗日的假臉具，暴露出獍獍面目，終日製造磨擦，導致糾紛，我們與敵人正作着死生決鬥，尚不知勝負誰屬之際，共匪已迫不及待企圖發動內亂，操戈同室，我是以南明史事爲鑒，盼望共匪有所覺悟。其實我的話都是白說。共匪自抗戰一開始便與日本軍閥合作，專掣國軍的後腿。中國果真搞亡了，也不要緊，他們可做蘇俄的石敬瑭、劉豫，又何嘗不可以做日本的石敬瑭、劉豫？

「歷史又將重演嗎？」則是勝利後蘇俄不肯自東北撤兵，爲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用「慕鳳」筆名。文中對蘇俄本說了若干不客氣的話。主筆方豪神父說恐妨礙邦交——那時國府和蘇俄尚未絕交——給刪去了。

「武化與武德」及「學生從軍」「莫再徘徊，莫再觀望」諸篇，則爲抗戰初起時直到號召十萬青年從軍時所寫。論時間前後也有七八年之久了。我雖然是個女性，自幼富於尙武精神，深慕花木蘭、秦良玉和法國聖女貞德之爲人。假如抗戰時期中我的年齡正當青壯，我也會去從軍。在國競時代，文化之外，尙須武化，而武化之建成，又非國民都有尙武精神不可。抗戰前，胡適先生在南遊雜紀裏提出「武化」的名詞，有好多學者名流，加以響應。左派文人則又大肆其譏嘲罵詈。爲了武化若果提倡起來，則軍備將刷新而士氣將振作。軍備原掌握在國民政府手裏，這對

共匪集團當然不利。

戰爭本來是一個極野蠻，極不道德的名詞，世界進化，大同實現，戰爭便應該放逐於地球之外，庶乎人類才可享永久的和平。我今日桑榆景迫，血氣全衰，想到孩提和少年時的想法，只有好笑。不過我至今還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文化之外，武化還是不能不提倡。在「武化與武德」一文中，我武化哲學根據，是建築在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律法上面的。我說：從廣漠無邊的星球系到肉眼瞧不見的微生物，一例受着弱肉強食，天演淘汰鐵律的支配。整個宇宙，日夜在互相搏擊，互相吞噬的戰爭狀態之中；整個宇宙，充塞着眼淚、血腥、勝利者的狂笑，失敗者的哀號。我們固愛克魯特金的互助論，卻也不敢排斥達爾文的物競說；我們固讚美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為藹然仁者之言，卻也不敢鄙薄尼采超人學說為狂人的夢囈。生命原是個悲劇，而人類的命運尤其慘酷，在這能自強者生存，不能自強者滅亡的鐵面無私的自然巨人之前，我們除了掙扎、奮鬥、向上、從死中求生，從絕望中殺出一條血路，別無辦法。

我這番話是在抗戰前說的，十餘年後在臺灣寫「閒話戰爭」意見仍然不改。我在該文裏又說：「我們民族之不願在生存競爭場中施展其身手，無非想避免死亡的危險，但死神脾氣很是奇怪，你越閃避他，他越要尋着你，教你死的機會更多，死法更慘」。下引宋金之戰，明清之戰為例，宋人筆記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諸記載，亡國之民被屠戮之殘酷及其衆多，讀者多已知悉。日軍攻陷南京時，屠殺我們無罪民衆至三十餘萬，這又是我們記憶猶新的事。亂定後，南京子遺

之民，在日偽統治下，就說沒有好日子可過，苟延殘喘總該可以吧。但最近我讀到無名氏所寫的「一百萬年以前」遺民之所遭遇，仍然與九幽十八地獄不相上下。讀之令人髮指皆裂，悲憤填膺覺得我們中國人真太不幸了。我想人生在世，總有一死，與其委委屈屈，像鷄狗，像蟲豸，死在敵人屠刀下，何如昂起頭顱，挺起胸膛，堂堂正正，死在戰場上。我這幾篇擁護武化，鼓吹從軍的文章，不唯可用之於對日抗戰的時代，也可用於將來對付共匪，反攻復國的時代。就說國界撤除了，人類仍在，這個宇宙仍然不免於戰爭，既有戰爭，武化仍然要講。爲的我的理論是建築於生物學上。

談到我的民族意識，也是同反共意識一樣是相當濃厚的。我談民族每與民族文化並重。我覺得以人相喻，民族是人的形體，民族文化則爲人的靈魂，徒具形體而無靈魂，那個人無非是行屍走肉，不足爲貴。「文化復興與青年的使命」談的便是民族文化與民族間的關係。我說國亡而文化存在，民族必可復興。中國半部全部亡於異族之手，不止一次，但中國民族都能翻身站起，恢復舊日的光榮。這因爲異族武力雖強，文化則無足言者，最後異族每被我們征服，且被我全部融化和吸收。我們所怕的是被文化比較高的民族所征服，在征服時期內，那文化較高的民族，用各種陰險毒辣手段來改造和消滅我們的文化。只須短短幾十年，我們便忘記自己了。再過百來年，或數百年，我們便被征服者所完全融化和吸收，這個地球上便沒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存在了。

不過我談民族文化也並不像那些保守派一樣，一味抱殘守缺，以保存原來文化型式爲要務，文

化是一種有機體，是有生命的。它要生存，就得適應環境，並且吸收營養，否則不待外力摧殘，它自己終將乾癟而死。民國五五年間，針對共匪的什麼「文化大革命」我們臺灣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故總統 蔣公揭櫫「倫理、民主、科學」三大目標，我響應 總統的號召，曾寫了兩篇短文。第一篇「復興中華文化談科學與歷史」，第二篇「論復興中華文化必須注重民主自由」，我說科學目標在於求「真」，求「確」故此最注重證據，拿不出證據來的，或證據不足的，科學就不肯相信它與承認它。因此，經過科學處理的學科，才能立得住腳，否則無論你說得天花亂墜，只是幻影空花而已。

我的筆鋒轉到歷史，我對共匪改造中國歷史的罪行，大加譴責以後，又說「有些頑固份子只想將中國歷史年代延長，將一些神話人物像什麼三皇五帝；有巢祝融，也當作真實的歷史人物。這是筆者期期不以為可的事。我以為假如我們在自由中國談歷史，五四以來史學家利用嚴密的科學方法整理出來的上古史，是大可取法的。耶穌曾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我以為歷史上神話人物歸之神話，歷史人物歸之歷史，才是研究與撰寫歷史的正當態度。」這番話我在我的屈賦研究裏也屢說不一。

故總統 蔣公於復興中華文化揭出「倫理」二字，見識果然高人一等。倫理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特色。自從歐美時代潮流衝突進來，受打擊最重的恐怕是倫理這一端。中國人從前在家庭骨肉之間最講究的父慈子孝，尊卑有序，於今父母對於子女之慈，比之從前，毫無遜色，而且加倍而

又加倍。這緣故是大家制度制度的解體，做父母的對上一輩沒有孝養之責，遂得以全副精力與心思來撫育下一代。從前所謂孝子是子女孝父母，於今所謂孝子，是父母孝子女。加之西洋傳進來的撫育子女之道，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說，使人惶然無所適從，父母對於子女等於捧着一只琉璃罌，唯恐一不小心打碎。其實父母這種愛只是動物性的愛，並不足取。每家子女受父母這種過份的愛撫，養成了飛揚跋扈的性情和需取需求的習慣，等於一個債主，一個怨家。我究竟是舊家庭出來的人，對此十分看不慣，是以每逢母親節，有人來索文，便要大發一頓牢騷。本集中「母親節談母道」「母親節談爲人子女之道」就是我這個老頑固的話。現代青年固然聽不進，現代父母又何嘗以爲然，能引起共鳴者或者是同我這一輩老年人吧。

但是滔滔頹波，一去不返，以前的家庭制度既無法恢復，想子女對父母像從前一樣的尊敬與孝順，是決不可能了。所以我又有「談孝道和安老問題」一篇。我勸爲父母者對子女不必那麼鞠躬盡瘁，也應當爲自己預留一手，就是積蓄一筆養老之費，以爲他日之需；更希望養老安老諸院趕快普遍設立。

本集最後是幾篇書評。我的書評本來不少，但都已收入他集。「評曹禺的北京人」是卅一年在四川所寫，發表於婦女月刊。那時抗戰尚未結束，曹禺在大後方的重慶，上演他的劇本，像「日出」「雷雨」等，都是抨擊中國舊文化，鼓吹共產主義不在話下，「北京人」也是象徵共產主義的。這個北京人是個介於人猿間的野人，曹禺說：「他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

喊就喊。他不怕死，也不怕生，他整個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他身體裏有充沛豐滿的生命，他肩膀上攔着人類日後無窮的希望」與那懾懾欲絕的曾老爺的一家成為強烈的對照。當時左派文人說的都是這一類的話，青年人知識浮淺而血氣又正盛，讀了這類文章，當然要將舊的一切棄如敝屣，紛紛跟着北京人走了。

「王寶川辱國問題」是替熊式一先生說句公道話。熊若是左派營陣中人，文章無論怎樣辱國，都沒有人敢批評他半句。只因他不是，左派便鷄蛋裏挑骨頭，說「信鴿請兵」是「吳三桂主義」。我氣不過，寫了這一篇。把那時左派教導青年的話，和左派的想法和作為，拿來和王寶川劇本作對比，看看究竟是那個辱國？那個不辱國？

「喜晤伍特萊女士」寫於民國五六年，那時政府召集了一個反共作家談話會，世界反共作家皆在邀致之列。伍女士也來了。我對於這位寫「失去的夢」的反共作家，神交已久，想不到於無意之間在臺北與之晤面。我稱伍女士為我「救命人」並非浮誇，是有幾分真實性，因我雖認識共產政權的罪惡，究竟還有些隔膜，若非「失去的夢」那種血淋淋的描寫，大陸淪陷時，人皆有「安土重遷」之念，我是不會毅然決然，拋棄家園，走上流亡道路的。我若仍留大陸，像我這樣一個激烈反共者，還有命嗎？

「反共學人衛聚賢先生」寫於民國六十一年二月間。那時衛先生潦倒香江，喧傳各報，臺灣方面正擬伸出援手。我與衛先生是學術研究的友朋，也是反共同志，我欽佩他堅強不屈的反共精

神，當時寫此文，促起各方面的注意，今日又將此文收於本集。

這本集子文字雖有六輯之分，部門各別，反共色彩仍籠罩全書，特別濃厚，倒是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本來，反共思想佔了我生命的大半部，代表我整個的為人，也只好由它去算了。

書名題爲「風雨鷄鳴」者，取詩經「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的意思。於今天色也將破曉，鷄可以不鳴了，但這漫長四十餘年，風雨中的不住長鳴，對世人雖不見得發生提撕警覺之功，自己卻覺得盡了一點子司晨的責任，大可爲慰。

民國六六年四月於古都

風雨鷄鳴 目錄

輯之外

自序……………一

第一輯 關於文藝的各種問題……………一

文學有否階級性的討論……………三

不信任自己……………三

五四以後北平的文壇和思想界……………一七

文藝節談當前的文藝政策……………三三

稿費與盜印……………三三

文藝到學校去……………三五

掃除障礙，大步向前……………四三

自共匪爭取留港文人談起……………四七

魔鬼的賣身契可簽嗎？……………五一

我們能任憑黃色文藝永遠猖獗嗎？……………五一

第二輯 關於復興文化的運動……………五五

文化復興與青年的使命……………六一